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4012

中国文学的思想创造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使命
——访谈赵炎秋教授

赵炎秋[1,2]，李松[3,4,5]

（1. 海南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海南 海口 571158；2.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3.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4.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5.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 102445）

摘要：《中国文学研究》作为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核心学术期刊，自 1985 年创刊以来，历经 40 多年发展，在几代学人的耕耘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深厚的行业影响力。本文通过对该刊前主编赵炎秋教授的访谈，系统梳理了该刊的诞生历史、运作逻辑、知识生产机制与思想内核。从创刊背景、定位演进、制度革新，到审稿机制、栏目设置、学术追求等方面，全面呈现了期刊在时代语境与学术变革中的调整与坚守。访谈聚焦期刊对学术创新与规范的平衡、传统与现代的调适、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等核心议题，探讨了 AI 技术冲击、学术评价体系变革等当下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同时展望了期刊未来发展方向与省属高校学术期刊的突围路径，以期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传承创新与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知识生产；思想内核；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I0；G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110-09

《中国文学研究》是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类核心学术期刊，自 1985 年创刊以来，历经四十余载薪火相传，在樊篱、龙华、凌宇、谭桂林、赵炎秋、杨合林、肖百容等学者的潜心耕耘下，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兼具学术深度与行业影响力的重要阵地，见证并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的发展历程。在学术生态不断变革、知识生产范式持续更新的当下，系统回溯期刊的创办脉络、运作逻辑与思想演进，不仅是对一份学术刊物四十余年发展经验的梳理与沉淀，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史、学术期刊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对探寻当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创造路径、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与启示意义。为此，笔者特地采访了曾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研究》副主编、主编的赵炎秋教授。赵炎秋教授深耕期刊编辑与文学理论研究数十年，对刊物的时代语境、学术定位、发展机制及学科使命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系统的思考，其分享既蕴含对期刊发展的实践复盘，更承载着对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传承与创新的理论叩问，必将为理解当代学术期刊的功能价值与文学研究的时代走向提供富有意义的参照。

收稿日期：2026-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赵炎秋，男，湖南邵阳人，海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李松，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海外汉学。

一、《中国文学研究》的诞生历史

李松：了解一个重要的学术期刊，首要的问题是重建其知识谱系、制度背景与时代逻辑。如果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么也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期刊。《中国文学研究》应时代需求而生，它顺应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需求和学术需求而诞生，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语境与学术语境，以及这一语境与期刊的关系。

赵炎秋：《中国文学研究》创办于 1985 年，当时是半年刊，后改为季刊。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学术界十分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老学者焕发青春，青年学者只争朝夕，但学术刊物比较少，大批学术成果需要发表的渠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后撤销，相关人员分别并入中文系和历史系）申请创办了这个刊物。

李松：回首《中国文学研究》的创办历史，结合全国文学学术期刊生态，可以发现本刊的坐标与地位。毕竟刊物的学术定位不是由抽象的自我认知确立的，而是在与其他期刊共同形成的“期刊森林”中与其他刊物进行比较后确立的。那么，创刊之初，创办团队希望它与国内其他文学期刊，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形成怎样的差异？

赵炎秋：中国期刊的办刊宗旨实际上和其主办单位的学术地位、行政级别存在关联。《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办单位湖南师范大学，虽是湖南省属的一流高校，但终究是省属高校，所以《中国文学研究》在创办伊始，并无与《文学评论》等一级刊物一争高下的“壮志”——即便如今也没有。创办之初，我们给刊物自我定位为省级期刊。到了 20 世纪末，随着办刊经验的积累、编辑力量的提升以及学术形势的需求，我们逐步将刊物自我定位调整为省级一流期刊。在我担任主编时，我们把刊物自我定位调整为省级一流刊物的第一方阵、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刊物。

李松：如果将期刊放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考察，可以发现，知识生产的制度条件、地域资源与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创办形成了一种外在的气候与环境。湖南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期刊创办反映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团队什么样的学科抱负？

赵炎秋：中文学科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资深学科，1938 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成立时中文就是创始学科之一（当时叫国文系），学术力量一直比较雄厚，在全国高校中文学科的学术排名一直稳定居于前 20 ~ 30 位。《中国文学研究》虽然是由湖南师范大学主管、主办的，但具体承办单位是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院一直重视《中国文学研究》，希望通过《中国文学研究》为学院打造一张学术名片，借以联系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同时也为提高文学院中国文学专业教师的学术水平提供一些帮助。可以说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成长与壮大，离不开文学院的学术资源和经费支持。二者之间形成了较好的良性互动关系。

李松：学术期刊作为知识史的一部分，其内在动力往往涉及人、制度、事件之间的关系结构。那么，在期刊创立过程中，有哪些关键人物、事件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赵炎秋：《中国文学研究》创刊 40 多年来，编辑部全体同仁，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编务，都兢兢业业，为刊物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杂志创办时的具体经过我不大清楚。我觉得应该提到谭桂林教授。他从 2000 年担任《中国文学研究》主编，到 2011 年卸任，在主编位置上工作了 11 年。谭桂林教授在刊物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使刊物在 2005 年和 2006 年进入了 CSSCI 来源期刊，之后保持为 CSSCI 扩展版期刊。如果“举贤不避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提及一下。我 2011 年底担任《中国文学研究》主编，到 2023 年底卸任，在主编岗位工作了 12 年（之前还做过两年时间副主编）。在我担任主编期间，刊物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刊物质量有所提高，并于 2015 年进入 CSSCI 来源期刊，一直保持至今。

关键事件方面，最重要的自然是 1985 年的创刊。除此之外，重要的关键性事件我个人觉得可以提四个。一是 2006 年杂志的编辑由个人负责制改为责任编辑制。所谓个人负责制，是指每期杂志由一位编辑全权负责；责任编辑制，则是将每期杂志划分为多个板块，每位编辑负责一个板块。这一转变保障了刊物编辑工作的连续性、专业性与常规化，避免了因编辑个人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及刊物整体发稿规划的缺失所造成的不足，提升了刊物质量。二是 2015 年《中国文学研究》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这不仅显著提升了刊物的学术地位，也有效保障了稿源质量，增加了知名学者投稿的比例。三是 2016 年开始实施的匿名外审制度。初期实行“内稿外审”，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的稿件须送外部专家评审；约一年后，所有稿件均纳入外审范围。匿名外审制度的推行，对提升《中国文学研究》刊发文章的质量，杜绝关系稿、人情稿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是 2018 年、2020 年和 2022 年刊物的三次改版。改版扩大了刊物容量，调整了版式，增加了发稿量，提升了组稿的灵活性，使《中国文学研究》从一个容量较小、版式较为局促的小刊，发展为容量更大、版式更为大气的学术大刊。例如，改版前刊物正文使用小五号字，行距较窄，阅读较为吃力；改版后正文改为五号字，行距亦有所增加，阅读体验明显更为轻松。

李松：鸟瞰《中国文学研究》40 多年的发展，可以发现其阶段性范式变迁的轨迹。如果追踪其知识结构如何随时代而变迁，那么，期刊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哪些方向调整？其时代背景或学术动力是什么？

赵炎秋：总的来说，《中国文学研究》与时俱进，力图紧跟学术发展步伐，保持学术的前沿性与引领性。从栏目设置角度看，《中国文学研究》40 多年来总体较为稳定，始终深耕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等几个领域。2022 年之后，为更好服务地方，将原先在现当代文学中零星刊发的湖湘文化与文学相关文章集中起来，设立固定栏目“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此外，在这些固定栏目之外，也根据需要设置了一些专题专栏。近一两年，专栏数量有所增加，栏目设置更具灵活性。从规范化与制度化角度看，《中国文学研究》也在持续完善。例如，2006 年将编辑工作的个人负责制改为责任编辑负责制；2015 年规定不刊登硕士生署名的文章，无论其为第一作者还是第二作者；2016 年实行匿名外审制度；2018 年推行主编与责编互相制约制度——所谓互相制约，即主编与责编各司其职，主编仅负责终审，不干预责编的初审，以防止主编“一竿子插到底”。从编辑力量角度看，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目前《中国文学研究》各栏目的编辑均为学有所成的学者，且大多具有教授职称，这对保障所发稿件的质量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变化与调整的内在动力源于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外在动力则来自学术发展的趋势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期刊日益提高的要求。

二、《中国文学研究》的运作逻辑

李松：《中国文学研究》的创办理念与定位决定了知识的边界和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您作为主编的任期内，如何界定本刊的核心定位？

赵炎秋：我担任主编时，给《中国文学研究》的定位是一份有质量、有追求、有人文关怀、在学术界有较高影响的学术刊物。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进入并保留在省级一流期刊的第一方阵，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刊物。我们强调刊物所发论文的学术性、创新性、理论性和厚重性。我们原则上不发鉴赏性的文章，不发书评和会议综述。

李松：一份有个性、有内涵、有思想追求的学术期刊，其精神气质往往会在选题策划、栏目设置等方面自然流露。《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筛选机制，或许在现实学术规范与理想化标准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您是如何平衡这一现实落差的？

赵炎秋：我们力求将《中国文学研究》打造为高质量的全国性学术刊物，为全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发表与交流优质学术成果的平台。在我们看来，优秀论文应兼具创新性、真知灼见与学术价值，且论证严谨有力、格式规范合规。然而在实际组稿过程中，这一理想标准难以完全实现，既受限于刊物自身

的学术定位，也受制于编辑力量与办刊经费等现实条件。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来稿中精挑细选，尽可能遴选出符合要求的优质稿件。

李松：您作为主编，如何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属于本刊发稿范围？本刊主要采用怎样的审稿机制？您认为，稿件最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赵炎秋：我们的刊名是《中国文学研究》，来稿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研究范畴、是否与中国文学相关，是我们判断其是否符合本刊发稿范围的主要标准。我们不刊登纯外国文学研究的稿件；但若研究涉及中外文学或文论比较，且与中国文学存在实质性关联，则属于本刊的发稿范围。《中国文学研究》实行三审制，即责任编辑初审、外审专家二审、主编终审。我们收到的稿件最常见的问题有三类：一是创新性不足；二是选题过于陈旧；三是论证不够严密，逻辑性不强，论据无法有效支撑论点，缺乏说服力。此外，问题意识薄弱、研究对象过窄、理论深度不足、篇幅过短等问题也较为常见。原则上，《中国文学研究》不刊登 8000 字以下的文章。

李松：您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如何处理“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关系？

赵炎秋：我们对“中国文学”学科边界的理解，主要依据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学科分类。凡在这两个体系中被划入“中国文学”的内容，即视为本刊所界定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在中国”是两个不同概念，虽有交叉，但内涵各异。“中国的文学研究”涵盖范围更广，泛指所有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文学研究活动；而“文学研究在中国”则属于学术史范畴，聚焦于文学研究作为知识实践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与机制。然而，本刊刊名《中国文学研究》并非意指“中国的文学研究”。其中的“中国文学”是一个专有学科名称，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并列，因此“中国文学研究”特指对“中国文学”这一特定对象的研究，而非泛指在中国开展的所有文学研究。

李松：您在实际编辑工作中，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倾向、理论关怀、写作风格、材料选择等方面有哪些要求？

赵炎秋：我们在方法倾向上没有特别的侧重，只要能切入研究对象，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任何研究方法都可运用。当然，如果研究方法较新，或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成果，我们自然更加欢迎。在理论关怀方面，我们希望稿件能够立足中国现实，与中国现实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写作风格上，我们要求论文兼具学术性、理论性与思辨性，强调表达深入浅出、清晰透彻，反对故作高深、刻意晦涩及堆砌新名词术语。材料选择方面，我们倾向于客观、原初、新颖且与论据契合、能有效支撑观点的材料。

李松：中国文学研究内部存在方法论冲突，《中国文学研究》如何处理理论研究、文本细读、跨学科研究之间可能出现的张力？

赵炎秋：不同的刊物在方法论上各有侧重：有的重视理论建构，有的强调文本细读，有的推崇跨学科路径，这本无可厚非，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塑造刊物学术特色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并无明显倾向——至少在我担任主编期间如此。我们认为，在方法论问题上应秉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当然，方法与理论密不可分：特定的方法往往服务于特定的理论，而一定的理论也通常内嵌其特有的方法论取向。因此，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实质上也隐含着对理论立场的选择。例如，过度强调文本细读，可能在无形中排斥宏观研究、宏大叙事或综合性分析。对个体研究者而言，这种聚焦自有其合理性；但作为面向学界的公共发表平台，期刊若过于偏向某一种方法，则易陷入片面性。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在方法论上宜保持开放与中立，不预设偏好。唯有鼓励各种方法“百家争鸣”，方能形成富有张力的理论对话，为读者提供多元视角与深层启发。当然，就单篇论文而言，其理论立场与方法路径仍需清晰一致，不宜将多种彼此冲突的理论或方法杂糅堆砌，以免造成逻辑混乱。

李松：当下，期刊的发展面临着行政性指标和学术性标准的双重压力。您如何看待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评价体系，例如引用率、项目资助等因素对刊物选题与审稿的结构性影响？

赵炎秋：任何刊物都无法孤立存在于真空环境，必然会受到社会、政府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个人看来，这些影响与制约从总体层面而言是必要的，对期刊的发展是有益的，像一年一度的期刊编校质量检查便是例证。当然，它们也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不过，只要这些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到期刊的编辑自主权，就应在可接受的范畴之内。就期刊评价体系而言，当下主要有三大体系，即北大、南大、中国社科院构建的评价体系。其中，南大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CSSCI，又称 C 刊）评价体系尤为重要。目前，针对南大评价体系存在一些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质疑评价体系存在的必要性；二是认为仅依靠引文率来评价期刊，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在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期刊评价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要么存在这种评价体系，要么存在那种评价体系；要么是显性的，要么是隐性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评价体系，而在于需要怎样的评价体系。我们认为，中国现行的三大评价体系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中国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学术的发展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南大评价体系以引文率为基础，其优点在于较为客观，能够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当然，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当下对南大体系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引文率具有片面性；二是 C 刊的评审标准导致了文章篇幅越来越长的趋势，使得 C 刊的整体发文率日益降低；三是引文率存在一定的可操作空间。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例如，可以将引文率的计算方式从所发文章数量与引文数量的比例，调整为期刊总字数与引文数量的比例；同时，扩大引文数量的计算范围，将二次转载期刊的转载、详摘和摘要等也按一定比例计入引文数量。这种调整并不困难，也不复杂。如此调整之后，基于引文率计算所引发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引文率、项目资助等因素，确实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选题与审稿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对文章篇幅有一定要求，也比较重视项目资助情况。然而，与某些杂志的做法不同，我们并未事先预估文章引文率，进而对引文预期较低的某类或某些文章直接拒稿，或将此类文章排除在发稿计划之外。

李松：从知识共同体的代际传承机制着眼，期刊不仅是发表平台，对推动青年学者的成长也不可或缺。那么，贵刊有过哪些探索？

赵炎秋：我完全认同你的看法，期刊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文章发表平台，更肩负着推动青年学者成长的重要责任。应该说，《中国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从作者身份方面来看，我们并未设置过高的门槛。只要是在读博士及以上的青年学者，其文章质量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都会给予发表的机会。从作者工作单位的角度而言，对于在二本高校及以下单位工作的学者，只要文章质量过硬，同样能获得发表的资格。而这些学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青年学者。此外，我们还专门组织过青年学者笔谈会，为青年学者搭建交流与展示的平台。当然，青年学者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在学术层面，他们尚不够成熟，社会影响力也相对较低。部分青年学者的文章虽然创意新颖、选题前沿，但在论证过程中存在逻辑漏洞，文笔也略显稚嫩。基于这些情况，我们对青年学者的发文数量作出了一定限制，基本将其控制在发文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三、《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

李松：《中国文学研究》对于学科趋势是被动跟随还是主动探索？在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古代文论、比较文学、湖湘文化等选题与板块设计方面体现了什么意图？

赵炎秋：《中国文学研究》对于学术前沿和学科发展趋势还是比较重视或者说敏感的，这种重视和敏感主要通过对稿件的选择以及组稿和约稿体现出来。编辑部各个栏目的编辑都由专业人士兼任，他们本身就处在学术研究的一线，了解学术前沿和学科的发展，这种了解在选择稿件时自然会发挥作用。《中国文学研究》的栏目基本上是在中文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设置的。这种设置的好处是比较稳妥，涉及了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不足之处是栏目不够灵活，无法迅速反映新的学术发展和趋势，这就需要设置相应

的专栏进行弥补。近几年《中国文学研究》在常规栏目之外加强了专栏的设计。这是一种好的补充方式，我觉得应该坚持下去。

李松：上述文学领域内部的学科分布，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例如，本刊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如何平衡，是否有学科倾向或特色？

赵炎秋：《中国文学研究》创立之初，编辑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较为狭义，主要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领域。此后，刊物的研究范围逐步拓展，相继纳入古代文论、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以及海外汉学与华文文学等内容。2022 年，为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刊物增设“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专栏。总体而言，刊物对“中国文学”的阐释与界定日益开放包容。不过受历史因素影响，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相关稿件仍占刊物发稿量的半数左右。在我看来，刊物应适当增加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类文章的刊发比例。当前，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已深度介入文学创作，文学领域及文学理论正经历剧烈变革，可研究的对象也随之不断丰富。若相关领域稿件刊发量不足，势必难以快速、及时地反映当下文学现实与文学理论的新动态、新发展。当然，这一问题更适合由现任主编及编辑部成员统筹考量、妥善推进。

李松：判断一本期刊能否为学科发展起到范式引领作用，显然不能仅关注论文的简单汇聚，《中国文学研究》是否在有意识地推动一些新领域的研究与方法论的创新探索呢？

赵炎秋：从某种层面来讲，期刊虽只是学术成果的发表平台，但绝非在学术发展中无足轻重。期刊对发表内容的筛选与取舍，本身就会对学术研究产生导向性作用；不仅如此，期刊还能通过主动策划选题、定向邀请专家学者撰稿等方式，进一步引领学术研究的发展走向。

《中国文学研究》在开拓研究新领域、探索方法论等方面也曾进行过一定尝试。例如，专门开设“湖南文学和湖湘文化”栏目，以专题形式组织文章，积极推动新观念、新领域与新方法的发展。然而，总体而言，在我担任主编期间，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我坚信，在新一届主编的引领下，编辑部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李松：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研究的边界正在扩大，跨媒介、跨学科、数字化趋势加剧，您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回应？

赵炎秋：我觉得跨媒介、跨学科、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个影响才刚开始。对此，文学研究界和期刊界应该未雨绸缪，及早进行研究、布局。具体到《中国文学研究》，我觉得至少可以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知识上及时跟进。打铁还需自身硬，编辑只有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有一定研究，才可能重视、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二是在版面上进行调整，给数字人文、媒介研究、智能创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发表空间。三是依靠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术力量策划选题、主动约稿，提出某些思想，推动某些研究的发展。

李松：如果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检视中国文学研究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不难发现，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关键交汇点。针对中国文学国际化研究这一领域，尤其是在海外汉学研究、跨文化比较等维度上，《中国文学研究》积累了哪些实践经验或形成了怎样的前瞻性构想？

赵炎秋：《中国文学研究》设置了“海外汉学”和“华文文学”两个栏目。海外汉学主要发表海外学者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华文文学主要发表海外华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觉得，海外汉学与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加强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交流，促进国内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验大致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要加强与海外汉学界与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二是要多争取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三是要有求异思维。所谓求异思维，就是要多注意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不同的理念、方法和研究领域，多关注那些运用了新理论、新方法，提出了新观点、新结论的文章，为国内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借鉴。

李松：现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已成为重要趋势，作为曾经的 C 刊主编，关于如何提高中国文科学术刊物的国际化水平，您有什么想法与我们分享？

赵炎秋：提高中国文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谈四点想法。其一，文科学术期刊国际化，不仅能够提高我国文科期刊在国际期刊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它能吸引更多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高质量论文在我国期刊发表，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其二，推进我国文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首先是国家层面的事情。它既需要中国整体国力的提高，也需要相关机构、相关政策的协调。实事求是地说，现在部分机构对于文科学术刊物国际化的重视还可以加强，认识还可以提高，相关政策还可以更加协调。比如在评价体系上，部分机构与高校比较偏重国外期刊，有的高校将 SSCI 和 A&HCI 的权重提得过高，有的甚至将其等同于《文学评论》等国内一级权威刊物。这种政策导向使得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国内期刊，将自己最满意的论文投给国外期刊，这是不利于国内文科期刊国际化的。其三，国内文科学术期刊国际化还有一个语言层面的问题。目前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中文还比较边缘。要使中文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英语那样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之前，可能还只能是加强宣传、交流的力度，将一些真正有创新、有价值的论文翻译之后传播出去。个人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增加一些面向国际学术界的二次文摘刊物，增设一些面向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网站。当然，这得由国家相关部门来做。其四，就文科期刊本身而言，在国际化问题上也应有所作为。比如，提高自身实力，多发高质量文章，争取进入 SSCI 和 A&HCI 系统；在相关规则方面与国际接轨，适当多发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多与国外期刊交流等。期刊本身也有一个向国外学术界宣传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的任务。现在大多数期刊发文都要求有英文摘要，但现在的英文摘要太短，无法把文章的精华都涵盖进去，是否可以考虑增加英文摘要的篇幅，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学者的观点？我的想法是，中英文摘要不一定要对等，中文摘要可以短一点，英文摘要可以长一点，期刊因国际化导致篇幅增加的问题可以通过扩版的方式来解决。

四、《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机制

李松：文学研究一方面存在内部的方法论自觉，另一方面又与时代之间互动推进。您如何理解文学研究的时代性？

赵炎秋：我个人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是前沿理论与方法。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也在发展，随着学术的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出现，跟上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发展步伐，是文学研究时代性的表现之一。其二是文学实践的发展。文学实践是广义的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文学实践又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新的文学实践推动了文学与文学思想的发展，这些发展需要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跟上文学实践的发展，是文学研究的时代性表现之二。其三是国家层面的学术思想与方针政策。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个顶层设计的问题，顶层设计的变动会影响到学术研究。适应顶层设计，及时调整研究方向与侧重点，是文学研究时代性的表现之三。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说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和新的文学实践，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海外的，但现在的趋势是学界对海外特别是西方的东西比较关注，对本土的东西关注不够，甚至有一定的轻视与忽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应该予以重视。

李松：如果说学术杂志领域确实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生态格局，那么您如何评价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类学术杂志在全国学术版图中所处的位置？

赵炎秋：决定中国学术期刊处于中心或边缘位置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级别，也就是杂志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和学术地位；二是地域，杂志是办在北京、上海，还是办在长沙，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不同的；三是质量，也就是杂志的办刊水准、发文质量的高低，以及是否进入了三大评价体系等。前二者是不变项，有点先天的意味；第三项是可变项，经过努力是可以变动的。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文学类学术杂志在级

别和地域两项处于中间位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努力的是质量。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文学研究》保持了比较高的办刊质量，进入了三大评价体系并且一直比较稳定地置身其中，在全国的学术版图中应该是处于边缘靠近中心的位置，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有一定的影响。

李松：反思学科内部的结构性张力的话，您认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焦虑点或者关切点是什么？

赵炎秋：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学科内部的结构性张力所引发的焦虑或关切点既繁多又复杂。我暂且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创新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张力。从总体方向上看，二者是一致的，但在局部层面难免存在矛盾。如何精准辨识并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向来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其二，传统与现代的平衡难题。传统是学科的根基所在，而现代则常常与热点前沿紧密相连，要实现二者的适配协调并非易事。与此同时，传统往往与经典相互依存，新兴作品则常常承载着发展趋势。如何评判传统作品的经典价值及其动态变化，如何甄别新兴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契合学术发展的方向，也常常让人感到十分棘手。其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全球化呈现出外向的特征，本土化则体现出内向的特质，从本质上来说，二者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然而，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矛盾，且这种矛盾处理起来难度较大。其四，宏大叙事与文本细读两种研究模式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具体的刊物而言，二者必然存在一个比例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这个度，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当然，宏大叙事和文本细读只是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思想与艺术、政治与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等之间的关系及比例问题。

李松：随着 AI 日益介入文本分析、写作建议、文献处理等，您认为未来文学研究会走向何种形态？《中国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应对？

赵炎秋：以后，文学研究者利用 AI 进行研究，应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文学研究出现人机合作的现象，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处理得好，能够促进文学研究；处理不好，则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的问题。对于期刊界或者国家相关管理机构来说，首先的任务是要确定文学研究对于 AI 的利用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的，到什么程度是不可以的。具体到《中国文学研究》，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意识到 AI 进入学术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它应准确掌握相关标准，拒绝那些 AI 起了主要作用的研究成果。我个人认为，AI 在学术研究中只应起辅助作用，不应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研究成果的基本思想、重要观点、主要研究方法等应该是研究者独立思考的结果。此举不仅旨在规避因机器取代人类工作而引发的不公平状况，更意在防范机器替代人类思考乃至最终取代人类思考的潜在风险。基于此，《中国文学研究》应当确立非 AI 参与研究的学术成果优先发表的原则。

李松：谢谢赵老师，最后还有两个有点“超标”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省属高校主办的杂志要达到较高的学术地位，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作为在《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了十多年的主编，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点您的经验？

赵炎秋：省属高校主办的刊物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要达到较高学术地位并非易事。可以努力的方面很多，我谈六个方面：一是做好自我定位。定位包括刊物的外在定位，也即刊物在期刊界的定位。定位过高，容易自不量力，劳民伤财；定位过低，则没有前进的动力。定位还包括刊物的内在定位，发文要求，刊物风格、面貌、特点等，都应有确定的目标。二是刊物不仅要做好学术成果发表平台，还要做好学术引领平台和学术创新平台。三是坚持质量第一，保证发文质量。四是尽量提高编辑部成员的学术水平和编辑水平。五是建设好一支友好型的作者队伍，使作者愿意关注自己的刊物，愿意将好的稿件投到自己的刊物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刊物首先要对作者友好，要尊重作者，坦诚相待。六是与同行期刊多交流、多合作，共同提高。

李松：第二个问题，如果将《中国文学研究》未来十年看作一个远景目标，您最希望它做到什么？希望它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赵炎秋：身为前任主编，面对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以作答。但倘若一定要表达内心的期望，我的

基本期望是《中国文学研究》能够持续保持当下良好的发展势头，稳扎稳打、稳步前行；而更高的期许则是希望刊物能在现有的坚实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与跨越，进一步精进学术质量、提升学术地位，成功跻身中国学术期刊的第一方阵，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一座不可忽视、难以绕过的学术重镇。

Intellectual Cre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ission of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o Yanqiu

ZHAO Yanqiu[1, 2]，LI Song [3, 4, 5]

（1.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3.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4.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5.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45, China）

Abstract：*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core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b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5, it has undergone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Under the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t has formed distinct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 profound professional influe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founding history, operational logic, knowledge production mechanism, and intellectual core of the journal through an interview with its former editor-in-chief, Professor Zhao Yanqiu. It comprehensively reveals how the journal has adapted and held steadfast amid changing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s,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the founding background, positioning evolu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view mechanism, column setting, and academic pursuits. The interview focuses on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balance between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norm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the impact of AI technology and changes in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journal and the breakthrough paths for provincial universities' academic journal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Keywords：*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academic journals; knowledge production; intellectual core; academic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黄声波